

百年来中国通史写作的阶段性 发展及其特点概说

陈立柱

【提要】 通史著述不仅汇集了历史学界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历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主渠道,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整个历史学的发展水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百年来中国通史大大小小出版了 130 多部,经过了教科书编写阶段、初步成熟时期、反省阶段与综合创新时期。

【关键词】 中国通史 发展阶段 写作特点

通史写作,或者是学人对于天人古今的考察,心里产生总结以往历史的愿望,自然而然地发而为书,如司马迁的《史记》;或者迫于时局、命运的峻严,要求全面彻底的考察省思,如近世以来《中国通史》的写作以及全球范围内《世界通史》著述的涌现;或者对于时局的巨变感到震惊,产生全面考察“何以如此”的动机,为此而专门著书,如波里比厄的《通史》。从根本上说,通史写作是史家对于人类历史命运具体而又整体的考察探究,是现实与历史的一次总交汇,它表示着学人对于作为人类的某一群体或整体的全面省思。好的通史著述意味着也代表着某一时期人类对于自己命运的理解、把握、认识与期待。

自从 20 世纪初叶第一批通史性质^① 的中国历史著述问世以来,中国通史写作在新的历史背景中走过了它的百年行程,大大小小出版了 130 多部,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于自我认识的强烈愿望与积极努力。回首往事,通史著述几起几波,不断翻新,和我们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联,时相照应,几乎所有的大史学家,或直接或间接地都参与了通史的著述与研究。然而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至今未有系统研究者。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做些探讨。

百年来的中国通史写作,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以此,我们把它分为四个阶段:教科书编写阶段、初步成熟时期、反省阶段、综合创新时期。

^① 本文所谓“通史”,指具有通史规模而又欲贯通者。是以有些著述虽只写得半部古代史,仍以通史视之。

一、教科书编写阶段(20世纪初—20年代)

1901年清政府颁行新学制,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大中小学堂,实行新式教育。新式学校的普通教育中讲授“中国历史”一门课,过去的《史记》、《资治通鉴》一类书不仅篇幅长,思想观念也不合于新时代,不能适用新学堂用书。这种背景下京师及各省编译局、所开始筹编教学用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有印书局、馆聘请学者编写的。于是一大批不同类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纷纷出世。一直到20年代,为着教学的需要都是通史性历史著作编写的直接动力。从总的方面看,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历史教材的编写借鉴教会学校用书及外国人著书的迹象十分明显。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外国教会在中国办了很多学校,也编有不少历史教科书,如各国别史、万国史鉴一类,甚至编有中国历史书。一些外国学者的著述也有了中文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日本人那珂通世用汉文写作的《支那通史》,不少学校直接翻印用作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他各种各样的《东洋史要》、《泰西新史揽要》等也纷纷出现,第一批由中国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大概没有不参照外国人的著述的。如柳诒徵编的第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①,就是以那珂通世的书为蓝本,再参以其他的著述增编而成。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也是“精选东西洋各著支那历史20余种”^②编辑而成。传布更广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他在参加校改西史译稿的基础上编写的。

2. 学习运用进化理论分析、著述中国新史。进化理论在19世纪60年代已传入中国,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后迅速传布于中国的知识界,它为中国人遭受外国侵略提供了最好的解释:我们落后,发展水平低,是以打不过人家。这种理论用于解说历史最成功的例子是夏曾佑的书,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世,三世又细分为七个阶段:传疑期、化成期、极盛期、中衰期、复盛期、退化期、更化期。本书有着明显的机械进化论的痕迹,但它传布甚广,30年代甚至被列为“大学丛书”,而以《中国古代史》为名继续印行,直到解放后还再版,说明进化论对中国知识界有着多么强烈的吸引力。其他有影响的历史教科书也都是用进化的观念编写的,如陈庆年的《中国历史》、徐念慈的《中国历史讲义》等。直到20年代吕思勉编《白话本国史》时还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③

3. 与通史编写有关的体例问题受到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19世纪末梁启超撰写《续译列国岁计证要叙》时已提出史学的任务是撰写新观点、新体裁的民史,打破以朝代为中心的断代史,历史应该贯通。1901年他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的一系列问题,并开始写作中国通史。从他的《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及给陈叔通的信中看,他的通史体例主

① 近代中国第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有几种说法,张舜徽先生《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认为《历代史略》“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俞旦初先生考其书为柳诒徵所撰,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② 《游学译编》第6册,1903年4月12日。

③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绪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订正版,该书“绪论”写于1920年。

要还是在改造传统史书体例,如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等。^①大约同时,章太炎也在考虑通史体例与著述问题。^②1904年夏曾佑编历史教科书开始使用章节体。这是西洋的方式,学者们以为它和过去中国的纪事本末体有相近处(实质上差别很大),它以篇、章、节、目为结构方式,因事以命篇,适应于叙事与解说历史因果的需要,和新思想颇能一致,因此国人争相学用。但同时考虑运用旧体例写书的人也大有人在,除前举梁、章外,如1905年许之衡也提出以后编史“其体当必祖机仲(袁枢)、君卿(杜佑)一派”^③。稍后陈忠鼎、曾运乾写有《通史叙例》一书,发扬旧史精神,提出“综二家,通三体,创殊例,成要册”的著史之法。^④讨论通史大义最有影响的还是何炳松根据法国人著书编写的《通史新义》,作者综合中西方关于编写通史的思想,从理论原理、考证方法、排比史实、编书方法,到中外史学史都有论列。何氏留学美国,译著不少外国史学理论及历史著作,研究章学诚史学也颇有成就,其书对通史编写产生影响是很自然的。另外,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也讨论了中国通史的主要内容、通史与专史的关系等,深为通史家们所关注。

4. 历史阶段的划分成为新通史著述的关键。过去的中国史家曾使用过“上古”、“中古”与“近古”一类的概念,但都笼统而不具体,不是经过界定的概念。现在,学人们把历史看作一个向前发展变化的过程,把握这种变化的情况而把整个的历史过程分段认识就成为必要。于是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的概念为学人所使用。如多数人把秦以前叫上古,秦汉至隋唐叫中古,宋以后叫近世,鸦片战争以后叫现代等。这种区划后来就演化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这种区划的出现与我们接受西方公元纪年的直线时间观是密切相关的,时间是连续的,一往直前的,历史自然也就是向前发展的过程。过去中国人用干支纪年,又用皇帝年号以为继统,这种时间观不是绝对的时空观,因此兴衰衰、一治一乱的历史观能与之相适应。近代西方在经典力学背景中形成的直线时间观传入中国,从而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的一般观念。过去研究历史观的人很少注意这个问题,以为我古人也有进化论、直线历史观^⑤等,这些是不对的。

5. 教科书编写到2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吕思勉、王桐龄^⑥等人已能就通史编写的理论、具体编书的技术等问题加以讨论,且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为标榜。此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高潮期,中国学人对于外国学术方法和学术语言已学会运用,思想观念甚为新进,以致政府当局加以干涉。如顾颉刚等人编写的初中用《本国史》,把三皇五帝视为传疑,导致其书遭禁止;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对岳飞、秦桧的评价与传统说法不一致,也被勒令修改。

① 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1918年。

②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附《龙书·袁清史》后。

③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

④ 《通史叙例》写于1914年,1933年南京钟山书局印行。

⑤ 这在一些《史学概论》书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庞卓恒主编、发行量很大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以后多次再版)一书中,这种情况就很明显。

⑥ 王桐龄:《中国史》,北京文化学社1926年出版第一册,以后陆续出齐。

二、通史写作初步成熟期(30—40年代)

这20年的中国通史著述成果累累,正式出版者约有近四十部。通史著述的质量也大大提高,开始从纯粹的编辑教科书向在教学的基础上,注意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思考民族历史命运方面发展,以“通史”为名的著述已很普遍。代表作有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吕思勉《中国通史》等。具体说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1. 有关通史著述的理论问题有了深入的讨论,较重要的通史作家对于通史理论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如周谷城提出了“历史完形理论”,认为通史是整个人类(民族)过去的的生活,是人的活动自身。他还详尽地分析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以及当时流行的章节体裁的优缺点,指出它们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或曰完形的历史。^①钱穆则认为写通史“要在于能于国家民族的内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②。吕思勉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针对高校通史课时不断减少而教学要求又要与中学不重复的情况,他提出高校通史课内容应该注重制度、文化、民生、日用与学术思想诸方面,所著《中国通史》上册,分19个章目叙述中国历史文化诸方面,全面又有深度,开拓了高校通史课教材编写的新路子,在诸多通史著作中别具一格。^③当时每一重要通史著作出版,常伴有长篇大作的“绪论”、“导言”或“引言”,用以阐述自己的通史思想。对通史写作的理论问题做深入系统的讨论,应该说是通史著述走向成熟的标志。百年间较重要的通史著作有相当一部分写成于这一时期^④也说明这一点。

2. 唯物史观对于通史写作的影响越来越大。30—40年代出版的许多著作中,使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类的概念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人越来越多。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等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一些后来被定为资产阶级学者的人,也有使用社会形态术语进行历史划分的。至于承认经济可以解释清楚大部分的历史事项就更为普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后来居上,与这种学术大趋向是有一定关系的。这种局面的造成是随着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大讨论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读书杂志》的主编王礼锡说,“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⑤。大论战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问题,实质上即是中国通史的理论问题。后来的通史作家很多人都参与了这场大讨论。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中国通史表现出唯物史观的影响与倾向就很自然了。

3. 通史著作虽然仍多是教学过程中积久而成,然精神旨趣多不限于教学,多数学者已能注意洗炼融会贯通的修史功夫,把历史当作有其内在一贯性的民族生命运动来看。像周

① 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48年第12版。

②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③ 吕思勉:《中国通史》,原分上、下册,现以《吕著中国通史》为名合为一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再版。

④ 参见李萍:《中国通史写作的两次高潮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⑤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

谷城、吕振羽、钱穆、范文澜、缪凤林^① 诸人的著作都有这样的特点。吕思勉新著《中国通史》和他 20 年代编写的《白话本国史》相比,最能显示通史成就在这一时期的提高。《白话本国史》写得也不错,直到 40 年代尚为顾颉刚等人所推扬^②。但吕著新通史在内容编排、理论认识上都要深刻得多,摆脱了以前学习模仿外国人编书的印迹,尤其是对具体史实的叙述,科学性大大提高了。此时期的吕思勉还认识到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目含义不确定,不适宜于划分中国历史^③。因此他的新通史就没有用这些名目来编排。因为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新通史的通贯意识更加明显了,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有听其迁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④

其贯通意识于此可见一斑。吕先生曾写有约三百万字的四部断代史(即《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五部专史(即《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宋代文学》、《制度史五种》)和《史学四种》以及大量的读史札记,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写通史,能做到融会贯通是不难想像的。台湾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⑤,可谓知其人。

4. 对通史著作的不断的批评性研究,促进了通史著述走向成熟。1932 年邓之诚说:“坊间所见之本……详则嫌其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⑥ 周谷城也批评说,“过去史书只以静止为对象,而不以活动为对象。”^⑦ 其他如范文澜、钱穆、缪凤林等通史作家也都认为流行的各种通史书不能叫人满意。学者间还有专门著文批评通史著作的,如罗梦珊^⑧、王抱冲^⑨ 等人就写有这类文章。蔡尚思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各种通史著作分期混乱、理论认识不明确提出系统批评,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也说,至今仍然没有一本通史书“达到理想的地步”^⑩。这种不断的批评正是通史不断走向成熟的推动力。

①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完稿于 1942 年前后,1943 年出版。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一章第一节“通史的撰述”,胜利出版公司 1947 年版。

③ 见吕思勉:《先秦史》“总论”,该书写成于 1941 年。

④ 《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9—370 页。

⑤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⑥ 见邓之诚为黄现璠等编《中国通史纲要》写的序,北平文化学社 1932 年版。

⑦ 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 1948 年版。

⑧ 罗梦珊:《论中国史之整理与重建》,《东方杂志》38 卷第 16 期(1941 年)。

⑨ 王抱冲:《理想的中国通史》,《大学》1 卷 9 期(1942 年)。

⑩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一章第一节“通史的撰述”

三、反省阶段(50—70 年代)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历史研究也为之一变。大陆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新阶段, 凡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的著述均被打入冷宫, 通史写作出现修订再版的热潮。港台社会流行的通史书也多是再版或修订以前的旧著, 直到 60 年代才有像样的新通史出现。因此我们叫这一时期为通史著述的“反省阶段”。其主要特点有:

1. 大陆通史撰述开始分工合作、主编总其成。如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 也是多人供给资料而后成于一手的。港台通史书还是独立制作、各为其说的居多, 如较著名的罗香林著《中国通史》、黄大受的《中国通史》、陈致平的《中华通史》、张其昀的《中华五千年史》等等, 都是一人独立完成的, 尤其是陈、张二人的通史, 洋洋数百万言, 由一人独立完成甚为不易。

2. 修订、再版成为此一时期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大陆如范文澜、吕振羽等人的著作, 原就是唯物史观指导的, 现在则进一步加以修订。当时的修订工作主要是进一步完善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作为新的通史著述的框架结构, 或者运用但不彻底者, 现在则修而改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周谷城的书。旧版周著《中国通史》已使用一些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类作为篇章结构的大目, 但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不彻底的。如其书“导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历史即阶级斗争史, “若谓这等看法就是历史自身却大不可”^①。而修订本则明言: “历史即斗争的过程。”^② 就此仍有人批评他的书, 说他阶级观念不够明确, 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问题^③。港台虽极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作中国通史的, 但修订后再版也是通史著述共有的现象^④。

3. 独立于教学的通史著作开始出现。直到 40 年代, 通史写作基本上都还是受到教学的促动, 纯粹地为着总结反思民族历史命运的通史书则出现于这一时期。较有名的如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 张其昀的《中华五千年史》等。范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张书规制巨大, 设计精心, 写作特别, 读他的书颇有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感觉, 几十卷本的中国史, 图文并茂, 全神贯注, 写出了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⑤。在同类著作中新颖别致, 值得借鉴。能不受教学目标的影响而纯然地写作通史, 这才是通史写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4. 通史写作的理论体系问题引起人们热烈地讨论。这在 50 年代的大陆尤其明显。过去学校的通史教学多是由非马克思主义史家担任的, 现在改用唯物史观来讲解, 一时间难以适应。因此当时通史教学有着两个明显的倾向: 要么偏重于一般历史规律的讲述, 这是过去讲社会发展史的路子, 公式主义很明显, 不能交给学生具体的历史知识; 另一个便是偏重于

① 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 开明书店 1948 年版。

② 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修订版。

③ 参见古田:《评周谷城〈中国通史〉》,《新建设》1958 年第 7 期。

④ 有关情况参见傅乐成:《中国通史》“自序”, 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 1980 年版。

⑤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 我见过该书前九卷本(北京师范大学藏本)。

历史人物的讲述,这是马克思以前世界各国历史编写的共同特点,注重帝王将相^①。在学术界,大家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②、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等问题,实际上都是通史理论或说通史写作的核心问题,说明学者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历史方面逐步走向深入(当然也存在教条化倾向)。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于通史著作批评的很多,如范文澜、翦伯赞批评尚钺的书,古田批评周谷诚的书,尚钺、周谷诚的反批评以及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本与教学的批评,还有不少自我批评的。通史批评多是观点与体例的讨论。港台学者的通史讨论没有大陆热烈,但也有一些^③。

从著作的数量看,此时期虽长,写出的通史书并不多,大陆尤其少,像郭沫若、翦伯赞主编的书都是起步甚早,50年代即开始编写,但最后成书则在70—80年代。港台到60年代以后通史写作又呈复兴之势,大部头的通史书颇有出版。这与这一时期的时局变化密切相关。大陆上此一时期先是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接着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台湾地区是蒋介石的独裁专政。这些政治形势对通史写作都在大环境上产生了限制,诚如尚钺所言:“历史科学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④

四、综合创新时期(80—90年代)

进入70年代后期,大陆学术恢复生气,通史著述也再度兴起。高考恢复后,适应大学教学的需要,一时间各大学纷纷编写中国通史教科书,像《简明中国通史》、《中国通史讲稿》、《中国通史新编》、《新编中国通史讲义》之类的著作,甚为常见。初步统计,80年代编写的通史性著述约有二十部左右。进入80年代后期,通史研究与写作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通史书。90年代开始,学者们纷纷编写大部头、多卷本的中国通史,出现了新一轮通史编写高潮。这一时期较重要通史著述在成就上都颇为可观,一方面借鉴、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所以叫它是“综合创新时期”。此一时期特可注意者有以下数端。

1. 参稽中外又落脚中国的新体例的创造。百年来由于新学术研究是向西方学习来的,章节体一直都是通史表述的主要体裁。但对于民族传统史学体例革新与发扬的探索工作,一直都有人在做。40年代罗尔纲编《太平天国史稿》,探讨改造利用纪传体编史的新方法。50年代他由序论、纪年、志、传、表五部分组成新的纪传体,再编《史稿》^⑤。70年代白寿彝先生写通史,开始探讨新综合体,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相配合。这种体裁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时下流行的

① 有关情况尚钺在《关于编写和讲授本国史的指导思想》一文(载《新建设》1951年第5—6期)中有详论。

② 指当时史学界讨论的五个历史理论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③ 《中国通史论文选辑》,久洋出版社1985年版。

④ 《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⑤ 罗尔纲:《我对纪传体的批判继承》,《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章节体”^①。这可以说是参稽中外又落脚中国的通史体例的新创造,它为大型史书的编纂,多层次、多方面地反映中国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方式。新体裁的创造也是通史写作在新形势下寻找民族自我表现方式的一种努力。张舜徽的《中华人民通史》^②是针对王朝体系和章节体而做的又一种探索。他把全部中国历史的内容分在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六个部分,编下又各分子目加以叙述,这也可以说是把历史以政治、经济为主引向以广义文化史为主的一种努力与探索。

2. 对通史写作做全面整体的理论思考。从理论上考虑编写通史的有关问题,应该说是和通史编写同时起步的,30—40年代的通史作者已做了很多的工作。编写一部大部头的中国通史,理论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安排、篇章谋划、写作方式、思想贯穿等问题都是首先需要考虑的,这不啻是对于历史基本理论问题的一次全面清理。白寿彝先生在编写《中国通史》时,对通史理论首先做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多年来深思熟虑的关于通史写作的各个方面的理论思想汇为一书,作为大通史写作的总指导——“导论”。《中国通史·导论》卷共讨论了中国历史上九个方面的66个问题^③,差不多也就是中国通史写作的整体观念、主导思想、框架构设、注意事项等内容,这比过去所有通史书的序论、导言等都要详尽、具体而又全面。能详尽地考虑各个方面的问题,在整体贯通上才可能有更高的境界。可以说,白先生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深刻的。

3. 合作编写的主编责任制新经验。通史内容范围广大,非有学贯天人、事总古今的本事,一人之力是不易成事的,学贯天人古今在学尚专门的今天又谈何容易。因此合作编写通史早在20年代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就提出来了。然则通史著作又要求内在精神一贯,多人合作常不易做到弥合无间、浑然一体。是以几十年来的通史著作,戛戛独造的总是多数。要想在历史叙述的各方面尽力做到实事求是,特别是今天所强调的科学性,势必要走合作编史、分段写作的路子。50年代开始合编的中国通史书都还是教材,而且篇幅也有限。白先生《中国通史》参编人员仅著名学者即有几十位,各方面的专家学人参与写作的更是多到五百余人,全书内容有1300多万字。白先生的路子是先主编一部小型的《中国通史纲要》,既可作为大通史写作的纲领,又积累了合作编书的经验。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导论”为灵魂,组织著名学者分任主编,分段合作,并提出在“通”字上下功夫的编史要求,然后总主编字斟句酌,最后把关,使全书脉络贯通。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内容汇集颇有法度,合作编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4.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写作的中国通史开始出现。这有许多方面的表现。一是不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指导的中国通史开始编出。50年代以来的通史书主要都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指导下写作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通史书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几乎没有)是为每一部通史的基本框架。进入90年代这种通史模式虽还占着主流的地位,但是使用其他一些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或者平铺直叙按朝代编写的通

① 刘雪英:《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写》,《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上、中、下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989年出版。

③ 参见瞿林东:《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简介》,《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史书也颇有发展。如樊树志的《国史概要》、李定一的《中华史纲》等,说明通史写作的指导思想开始多元化。二是以《中国全史》、《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通史》、《中华文明通志》等为名的著作纷纷出现。过去这些著作多被认为是专门史,实则这类著作多有贯通天人古今的精神,可视为通史写作向纵深方面发展的表现。过去的通史著作注重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与文化方面虽也讲到,多是附属性的,在内容上不占重要的地位。这种通史体系可以概括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通史著述。新的发展让人们更加注重社会生活与人的精神面貌,对文化史的重视可视为走出旧体系通史著述的一种努力。历史是对过去人们生活存在的叙述,用现代观念构筑的过去的历史,尤其是我们时代认为重要的历史内容尽管不可缺少,但它说出的并不是历史全部,因而也不应该是通史编述的主导方式。我们学习西方的学术方式与思考方式来写中国的历史已有很长时间了,我们该深入反省,寻找我们民族的方式来看中国的历史了。文化史的注重可以看作是朝着这方面努力的开始与表现。三是通史著述因其主旨不同,类型上也颇有差别。已有的通史书大略可以归为以下四种类型:(1)大典式的通史,力求全面、具体、庞大,动辄千万字以上;(2)注重知识性与科学性的通史教材,多为大学用书;(3)提供一般国民基本知识的通史书;(4)描绘民族历史变迁与精神风貌的通史书,这类书着重文化精神与中外比较。这几种类型的通史书以前也有,但应该说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才显示出类型上的差别。

新时期通史写作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限于篇幅这里不能细说,有关情况可以参考笔者其他一些相关的文字。

据说,“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①渭水之畔的诸侯宫室自然不是六国王侯的宫室,但是它们很“像”,前者是照着后者的模样制作的,即司马迁说的“写放(仿)”而作。写,《说文》训“置物也”,“写”在汉语里原来就是置换物事的意思,把事物自一处置移于另处,如“写酒”。中国人把绘画叫“写真”,说的也是把物事置于画中。历史写作与此可谓类似。历史家把过去的历史人物写进他的书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置换”,过去的人事通过意象性的汉字放置于他的书中。我们常说,“翻开历史,古人的道德形貌置诸眼前”,即是指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写作的,历史研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写”字上去理解,去认识。写得可信,或者说很“像”,我们会说它符合历史实际,是信史,写得不好,最大的缘故是它不像、不真。历史著作写得好坏,决定于历史家的才情、学养与识见的高下,或者说义理、辞章、考据的功夫如何。把住“写”,或者是理解一切历史问题的关键。这是我们从写作方面来看百年通史著述的出发点。

(作者陈立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邮编:230053)

(责任编辑:侯云灏)

(责任校对:王 凌)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